

目 录

回忆三支队在解放战争时期的财税工作·····田 章 (1)	
肝胆相照 同舟共济·····	
——简述始兴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的朋友···张 艺 (10)	
峥嵘岁月·····	
——回忆中共始兴县委宣传队·····陈方畴 (22)	
回忆在明达小学工作的片断·····李子魁 (33)	
李士斌打城·····李子衡 (37)	

人 物

华振中将军传略·····谢彦枚 (41)	
始兴第一个留学生——陈模·····陈爱庭 (48)	
一生戎马坎坷 终于投身革命·····	
——记爱国军人陈强·····张 艺 (50)	
饶振维医生事略·····纪庾、文溪 (56)	

史 料

基督教与天主教在始兴·····刘旭清 王树清 (59)	
解放前始兴商行组织概况·····李士俊 (64)	
瑣谈罗所排行·····肖庆林 (87)	
土匪黄耀祥窜扰始兴·····王树清 (71)	

风 情

清化风俗（连载）.....丁 汉（74）

浅谈澄江山歌的特点及风格.....谢宗生（77）

旧志资料摘抄

始兴贡生事略.....陈爱庭（79）

简 讯

我县史志工作人员参加“二战时期根据地史讲习会”.....

.....刘志刚（82）

我县举办第二期修志业务学习班.....县志办（82）

第二次文史工作座谈会召开.....文史办（83）

封面照片：赖岗宝溪茶庄遗留至今的抗日标语

.....陈德标提供

回忆三支队在解放战争时期 的财税工作

田 章

北山部队原是风度大队北山中队与东纵、珠纵北撤烟台后留下的部分同志共同组成的一支革命武装。1946年6月，东纵北撤后，为粉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阴谋，据上级党委决定，进行绝对隐蔽。当时有吴伯仲、唐胜标、朱光荣、何祥、田章、邓良汉、叶福、张发桥、苏红等四十多人，分别在甲下山、老黄塘、沿溪、武岗等四个地方坚持隐蔽了六个月，直至一九四六年十二月开展了反“内战”、反“三征”（征兵、征粮、征税）才又开展活动，首战甲下，打击了南雄征粮队一个中队六十多人，全歼一个分队，击溃一个中队，在北山首创以少胜多的战绩，振奋了指战员和人民的革命斗志。接着在一九四七年春节初二夜又打了新庄水乡公所，全歼一个自卫队。与此同时，部队组织群众工作组向群众拜年，大力宣传全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和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破坏“双十协定”的罪行，发动群众起来反“内战”反“三征”，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中国。群众积极拥护，广大青年踊跃参军，到一九四七年七月，北山部队逐步扩大到五百多人，还有民兵组织四百多人。月底在大原召开北山全军大会，由陈

中夫同志传达五岭地委决定：北山部队成立为粤赣湘边总队第三支队，支队长吴伯仲、政委云昌遇，政治部主任伍仲华（陆一清）。武装方面设立三个大队，唐胜标任第一大队长，朱光荣任第二大队长，何祥任第三大队长，田章任支队部副官。自此，三支队建立财政机构和供给制度，开展了游击战争中的财税工作。

三支队的财政机构，支队部最初设副官，后改设军需和若干个税站，大队设副官，连队设事务长，分别统管三支队财政、税收和供给等后勤工作。

财政后勤机构建立以后，首先是设立税站开展税收。根据北山的情况，支队先后设立滨江、马眼、苦竹三个税站。滨江税站早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已初步建立，负责人是张发桥。三支队成立后，张发桥调第一大队任连长，税站由番仔（魏玉文）负责。一九四八年三月主力部队奉命开到江西上游崇义活动时，因敌人扫荡，税站停止活动，到五月，部队回到北山，恢复税站，由王伟金负责。一九四八年冬，滨江税站在走马连收税时被敌人袭击，王伟金牺牲，税站调董华负责，直至一九四九年九月解放。滨江税站主要征收货船和竹木排税。在正常情况下有手枪组四人，步枪组六至八人，若遇敌情异常时，临时增加武装人员。如探明有军船或奸商雇请敌军护送的消息，则增加一个中队以上的兵力对付。一九四七年冬一只敌军保护的奸商船，满载黄烟、土纸和腊肉、腊鸭等货物经过税站，我们即组织火力全歼敌军，货物全部没收。经教训后，未发现过军船了。滨江税站的活动地点从棠家村、走马连、老黄塘、鹅井、新寨、黄田一直伸延至坵坪小水，范围达二十多公里。我们的活动规律敌人不

容易掌握。税站人员生活十分艰苦，晴天晚上睡在村边山上，雨天睡在草棚牛栏里，白天利用地形掩蔽在河边，不管风吹日晒雨淋，坚守在工作岗位上。只要能收到税供给部队，同志们就感到是最大的快乐。滨江税站的收入平均每天四十至六十元（银元）左右，一个月大约有二十天能收到税，每月收入八百至一千二百多元。黄金、港币以银元为计算单位，黄金每钱折银元十二元，港币每百元折银元十五元，一般港币很少。

马眼税站主要收纸税。解放前，马眼、江口有几家纸站，北山苦竹一带生产的玉叩纸、统纸、京文纸多数由马眼、江口纸行收购。因江口驻有敌正规军一个连和一个自卫队，增加了马眼税站工作的困难，为了保证部队发展和供给，我亲自去马眼做好林万青的工作。林是江口一带的开明绅士，同情革命，他热情支持我们并推荐赖绍华负责代收税款。赖当时在马眼开什货店和纸站，我们就把税票交给他代收。马眼税站开征后，每月可收银元一百多元。为了避免暴露，我们议定每月到他那里取款一次。如我们逾期未去取款，赖就亲自将税款送到珠岭下交通站饶呀古家里转交部队。一九四八年冬，经取得我们同意，赖任保长后仍积极代管收税，还经常通报敌情，掩护部队人员转入白区工作，从未发生事故，表现了对革命的忠实。

苦竹税站是在一九四七年五月三、五支队联合歼灭苦竹圩自卫队后建立的。每逢苦竹圩日由支队部派人到圩上收纸税和牛、猪屠宰税。为了确定苦竹圩税收准确数额，我亲自到苦竹圩参加两个圩日的收税工作，每圩约可收银元四十至六十元，每月六个圩日可收二百四十元至三百五十元，基本

上负担了第三大队百分之五十以上的供给。从而确定苦竹税站交由第三大队包干负责。

三支队的税收制度，由支队部统一印发二联制税票，第一联兰色存根，第二联红色交纳税人，税票样式如下：

(表)

粤赣湘边总队第三支队税票				编号第	号
货物名称	数量	货价金额	税率	纳税金额	备考
合计税额 白银 元 黄金 港币 元					
经收入			(盖章)		
公元一九四 年 月 日					

凡收税款必须填写税票交给纳税人，严禁收款不给票，也不能以白条纸代作税票。每本税票一百份，用完要将存根缴支队部核销。除苦竹税款由三大队包干外，其余两个税站的税款统一上交支队部。演江税站每星期缴一、二次或满二百元时即及时上交。税站向支队部交税款时，要有二至三人护送，以确保安全。由于同志们的革命自觉性和高度责任心，各税站从未发生贪污、挪用和遗失税款的事。

支队部收到税款后，除保留一定的预备金额外，全部分发给大队，统一采购油盐、柴、菜、衣服、草鞋、竹帽、电池等物资分配给连队。打军船、军车所得物资和演江税站由

民船采购的物资则由支队部统一分配。

部队的税收工作是在极其艰苦和危险的环境下进行的，所以要求十分严格。当时所拟定的工作原则是：

1、保证部队供给按规定税率应征的税，不论多么艰险，必须坚决收到。税率按货价征收10%。

2、为了保证商人纳税的积极性，坚决按税率征税，不得随便增加税率和税额，使商人纳税后仍有利可图。

3、简化税目，决定只征一种“行商税”，税率税目稳定后，商人心中有数，预先备好税款，船到即交。

4、简化手续，动作要快，因河两岸常有敌人巡逻，若船停过久，被敌人发现后就开枪扫射，所以手枪组在收税时多数跳入船上，边行船边征税，步枪组则沿江监视敌人，如有敌情，即投入战斗，保证收税工作正常进行，滇江税站就是在我武装人员严密的护卫下使敌人无可奈何。

部队的财经工作除加强税收这一主要工作外，就是努力做好粮食征集工作。因税收收入有限，全部粮食靠钱买仍有很大困难，我们经过调查和征求群众意见后，决定采取三个办法：

（一）动员捐献。对各村公尝，在做好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发动捐献，例如老黄塘邓屋收租六十担，通过邓良汉去做工作，自动捐献三十多担。珠岭下饶呀古管的公尝收入三十多担全部捐献，各村公尝都或多或少的捐献出来。

（二）动员借粮。主要对象有土地出租的和放高利贷收入的地主、富农（那时未划阶级，群众叫“大富佬”），动员自动借出粮食支持革命，大富佬虽是少数，但影响很大，是社会上的上层人物，借粮需顺利进行，首先要做好他们的工作。

作，那时没有政权，完全靠做思想工作讲清道理，对愿意借粮的表示欢迎，并给回借条；对有粮不借推三推四的顽固分子则进行批评教育，争取转化。但也有极少数反动分子不但自己有粮不借，还煽动别人不借粮，甚至勾结敌人陷害积极借粮户。我们就采取坚决镇压措施，如陆源何屋有一户就是这样的人。我们当反动土豪打击，抄其家财，将主犯处以死刑。清除了障碍，打开了局面。对有余粮的自耕农只动员自动借出一部分、卖一部分，借的写回借条，卖的按市价给钱。一般都采用现款购粮。为了我军控制区的余粮不外流，购粮价钱采取比市场稍优的办法。有的先付款就地储备，以后取粮。

通过捐、借、购三个办法，基本上做到大部分村有部队储粮。为保证各村储粮户的安全，只有支队大队领导知道。当时山区以造纸为主，粮食不能自给，故储备粮食较少；沿滇江平原储粮较多，部队在山区活动时要由平原运粮，我们就派若干武装护送。只有一九四八年三至五月敌人对北山大扫荡时封锁交通要道，有一段时间断了粮、油、盐、菜供给，同志们只好吃野菜、野果、山薯、竹笋度日，其余时间三支队的粮食基本满足。到解放时，尚有储备粮一百多担，当地群众义务送交县城支援南下大军。

此外，“打反动”也是一个收入来源。在游击区和白区，如发现有坏人将我军活动情况和伤病员掩蔽地方告密，则坚决以反动分子予以打击。例如陈大梅在珠岭下掩蔽养病时，因该村姓林的保长告密遭捕，我们便将姓林的保长处以死刑，并抄了他的家；我军伤病员在瑶头村纸厂掩蔽，因黄洞一名甲长告密而被敌人袭击后，我们将这个甲长处以死刑。

并抄了他的家；陆源乡长张三春经常以该乡自卫队配合敌军扫荡我驻地，还迫害当地参军家属和储粮户，我们先抄了他的家，以后又将他逮捕归案处决；陆源何屋一名恶霸有粮不借还威胁储粮户，即以破坏借粮论处，将其处决并抄了家；马市关桥柴塘一名大富佬有钱有粮，还有几支长短枪，开始通过各种办法向他借，不但不愿借还恶言诋毁，部队便派武装抄其家，搜出长短枪，并将他提到部队，经教育罚白银八百元释放。像这样的例子还有。“打反动”时适合部队食用的都搬走，除罪大恶极处死外，其余经教育愿悔改则罚款释放。通过“打反动”不仅在政治上打击了敌人，而且部队也增加了一笔收入。

部队指战员的生活管理，也是三支队财政工作的一个重要方面，以我的回忆是：

伙食方面：大米人平每天一斤半，每天两餐；生油每天三钱，生盐五钱，青菜每天一斤半，肉类未规定标准，有就供应，但在正常情况下规定每星期加一、二次菜，以银元计算，每人每次四角。那时加菜很简单，买了什么算什么，也无配料。抽烟的同志每月配烟叶一斤或烟丝半斤，从未配过香烟。

衣着方面：规定便衣面服、衬衣每年各两套、棉衣一件、卫生衣一条、毡子一张、草席一张、草鞋每月一双、竹帽每半年一顶，但多不能配齐。

日用品方面：面巾、牙刷、牙膏每半年一件，口盅每年一个，肥皂每月半斤，电池班长以上每月一对。那时指战员没有工薪，所需东西均由部队发给，部队有，指战员才有，部队没有，指战员也没有。

指战员生活虽规定了制度和标准，但因物资要从城市采购，往往因敌人封锁检查，有钱买不上，曾因托群众到县城买东西被敌人抓去坐牢，甚至有被敌人杀害的。珠岭下一名群众因给部队买了两对电池，被敌人当场枪毙，因此，指战员为保护群众自动克服困难。同时部队流动性大，遇到战斗时总要丢失一部分东西。一九四八年三月至五月这段时间，敌人以一个师的兵力进攻南雄、始兴，在北山区内太平、侯陂、陆源、鹅井、呈坪、上台六处建立自卫队，封锁交通要道，强迫群众五家联保，迫害我农村党团员骨干和基本群众，或抓坐牢或煽动自新等。这段时间部队生活十分困难，税收停止，粮、油、盐断绝，指战员们有一餐没一餐，甚至十来天没有粮食到肚，身上穿的衣服没有替换，个个从头发到衣服都生有虱子，开始害怕，后来习惯了，还给起了一个名字叫“革命虫”；草鞋是行军打仗不可少的，但也供应不足，大家经常光着脚板走路，脚板磨得茧厚长了蜂窝，坚实得很，不怕沙石、针刺，战士叫它“铁脚板”。大山里的山蚊又多又恶，咬后红肿，又痒又痛，但没有蚊帐，只得熏烟驱蚊度夜。到冷天，有卫生衣穿的就算不了起了，毯子多数一分为二，我与陈仲舒同志就是一张剪开两块，各得半张。牙膏、牙刷、肥皂基本上未供应过，多数指战员没有牙刷就用面巾裹着手指代牙刷，没有面巾就用双手捧水洗脸，口盅多数用竹自制的；战士们都是乐观主义者，在口盅上还刻上花鸟和革命诗句。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有一条可贵和自豪的，就是自觉克服困难，人人讲卫生，凡两人以上共餐，必用公筷，所以患病率很低。还有指战员自觉遵守群众纪律，不论怎样缺吃少穿，决不拿群众的东西，宁愿挨饿受

寒；没有烟抽，宁愿用干树叶代替。六、七月间马市地方的晒场上都是烟叶，大家一点也不乱拿，最多拾取农民丢弃的烟骨。由于纪律严明，群众对我们的印象很好。更可贵的是官兵一致，不讲特殊，没有等级之分，吃、穿、住一视同仁。领导对战士政治上关心爱护，有问题亲自谈心，帮助进步，同时亲自培养入党，生活上无微不至的照顾。那个时候，彼此共命运同呼吸，心连着心，关系十分密切，因此团结一致，战斗力强。碰上情况，领导一下命令，战士便冲锋陷阵，前赴后继，坚定不移，保证战斗和其他任务的完成。

三支队解放战争时期的财政税务工作，在党的领导下，以革命为动力，通过财税人员和全体指战员的积极努力，艰苦奋斗，在十分艰苦的情况下加强了部队的供给，保证了部队的生存和发展，最后配合大军和友军取得始兴解放的伟大胜利。

肝胆相照 同舟共济

——简述始兴革命战争时期我党的朋友

张 艺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始兴知识分子和广大人民义愤填膺，先后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和解放事业。不少有正义感的上层人士和国民党中有爱国之心的军政人员，拥护我党的主张，有的与我党团结合作抗日、有的与我党共同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成为始兴革命的真诚朋友：

原国民党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将军，大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同我党有过合作，是一位著名的抗日爱国将领。一九三六年，张将军委托曾跟随过他的进步人士（早年参加过“共青团”）张光第先生，并拿出十万元在彩岭村创办风度小学，任张光第为校长，解决了家乡子弟读书的困难。随后，张将军又在乡中修路筑桥，建造温泉浴室，深受村民和学校师生的赞佩。

一九三八年十月广州沦陷后，粤北形势趋于紧张，张将军支持张光第先生为抗日保卫家乡，保卫学校，组织自卫武装的要求，给风度小学拨了一批武器，计有：英制重机枪二挺，冲锋枪十支，手枪二十支，步枪二百多支，手榴弹一百多颗，子弹五、六万发和一批军用物资。随即在采岭村建立了由我地党同志和进步人士直接掌握的武装自卫队。这批武

器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发挥了重大作用。经办了十年的风度小学为革命战争和社会主义建设造就了不少人才。

一九三九年冬，张光第先生因调他任离开了风度小学，全赓靖女士接任校长。全赓靖是张将军的老相识，她一九三五年在北平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受到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陶冶，有正义感，是一位爱国的知识分子。在风度小学任教的地党同志以信任的态度支持她的工作，年长月久，全校长深深感到自己从来没有遇到过这么多的好同事，为有这么好的工作环境而自慰。她把我地党同志视为可亲可信赖的人。她任校长的六年间，积极靠拢我党，真正做到同我党同志肝胆相照，同舟共济。

在国民党反动派眼里，风度是“靠不住”的学校。为了进一步控制风度小学，一九四四年秋冬间，国民党始兴县长江锦兴、县党部书记长吴英禄和志锐中学校长杨瑜合谋，以加强保护县政府为由，以借枪的名义，企图收缴风度小学的全部武器。我地党洞悉他们的阴谋后，同全校长商量决定：一方面将校存枪支疏散到安全地方隐蔽；另一方面由全校长出面应付。一次，江锦兴到风度小学谈“借枪”之事。全校长对江锦兴说：“枪是张长官拨给风度的，你们要借的话，我们要请示张长官”。江锦兴只好空着双手悻悻而去。后来，尽管多次派员到风度催借，但得到的答复还是一句话，“张长官还没有回信。”“借枪”之事一拖了之。

一九四四年秋，我地党李福海同志在韶关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后关押在南雄监狱。我地党请全校长设法营救。全校长义不容辞接受我党委托，她通过国民党十二集团军参谋长华振中的关系，找特务头子云振中交涉。同时，介绍李福海同

志的爱人黎曼同志（地党）认识广东省侨务处长张天爵先生，恳请张出面营救。张天爵先生是全校长的老知交，他早年跟随过孙中山，参加过北伐，任过张发奎将军创办的志锐中学校长，是一位在社会上深受人们尊敬的爱国老归侨。张天爵先生敢于担风险，以自己侨务处长的身份，将李福海同志作为归侨保释出狱。

一九四五春节前夕，北江特委林华康同志到始兴传达省临委关于开展武装斗争的指示。一天，当他与同行的张泉林同志从英德到始兴，路经清化隘子圩时，被国民党驻军扣留。当时，林的手杖里密藏着临委《粤北沦陷后的形势和任务》的绝密文件。在这危急时刻，林华康趁国民党不注意，写了一张纸条，托一位农民送往风度小学。全校长知悉后，在学校地党负责人周耿光（现周健夫）同志陪同下前往营救。到达国民党军队驻地时，对着一位连长就劈头质问：“林华康是我校的教导主任，请来一位张先生来校教书，为什么要抓他们？”

国民党是以可疑分子抓林、张二人的，手上还拿不出证据，又看到这位知名人士驾到，只好吱吱唔唔地说：“贵校长对这两个人敢不敢担保？”全校长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们也真是，张长官信不过的人，能在风度教书吗？”连长听到“长官”二字，心里一怔，带着歉意说：“对不起贵校长，请多包涵。不过，上峰规定凡被抓进来的人，出去时要办一个具保手续，麻烦贵校长……”全校长具保后，释放了林、张两同志。

一九四五年三月间，国民党始兴县政府将长期同我党合作的县参议长张光第先生和坚持地下工作的田章、郭家兴等

一批同志投入监狱。全校长按照我地党意见，冒着危险找县长江锦兴说理，要他放人。顽固的江锦兴不但不答应还威胁她要交出已率武装部队进入抗日前线的吴新民同志（风度小学庶务主任，地党同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我风度抗日游击队决定攻打在桃村坝的县政府。一九四五年六月二十九日，游击队打跨了县政府，赶跑了江锦兴，营救了在押的所有同志和群众。

风度小学是在地方上享有盛誉的学校，地党许多同志，手持盖着校长全赓靖，董事长张发奎印章的通行条（当时我们称“护身符”），来往各地或经过国民党的盘查岗时都通行无阻，既保护了同志们的安全，又方便了我党工作的开展。但是，日本投降后不久，张光第先生和全赓靖女士遭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八约外营村（现沈所“八·一”村）知名医师陈大勋，长期在其儿子共产党员陈培兴、陈培松同志开导和影响下，思想开明，有爱国心，拥护我党抗日主张，积极支持我风度抗日游击队。陈医师主动给游击队送医赠药、出钱、出粮。一九四五年春夏期间，他曾先后慷慨捐献两批药品和家存的四千多斤稻谷给游击队。光复后，因儿子陈培兴是游击队的负责人，又撤往山东解放区，陈医师家被国民党反动派诬为“匪属”，受尽折磨，被害得家破人亡。在这极端困难和危险的处境里，陈医师仍同地党和游击队保持着联系。一九四七年春，在群众要求和地方上层人士具保下，他同儿子陈培松医生回到县城，又恢复光复堂药店（沦陷时停业的）开业行医。同时，我地党和游击队也恢复了抗日时期原在药店建

立的据点和交通站，一直坚持到解放。

沈所圩的邓佑隆（因人矮小，被人称为“三寸钉”），长期经营木材生意，为始兴著名巨富，在他儿子共产党员邓文礼同志的影响下，思想开明，支持革命。一九三八年春，他支持儿子邓文礼同志奔赴延安“抗大”。始兴沦陷期间和解放战争中他又多次捐献钱、粮支援游击队。

八约（现沈所地区）国民党乡长伍求祥（“抗日青年同盟会”成员，侧风村人），是乡中有威望的人士，与地党和游击队的领导人吴新民、周耿光、陈培兴、邓文礼等同志来往密切，拥护我党革命主张，积极支持游击队，经常为游击队传送情报，筹粮、购物和购买弹药。一九四五年冬，珠纵北上到始兴的一部分部队，到达伍求祥家侧风村的山岗上。伍求祥带领村中群众纷纷献粮、送菜给部队，解决了部队当时的供给。

八约花山村罗翼恩（“抗盟”成员），是乡中的开明人士。始兴地党县委书记、风度抗日游击大队政委周耿光（当时化名“朱化平”）同志经常出入他家，以他家为交通站。罗担任交通员任务。一九四五年九月，东纵北上五岭的部队在瑶区右拔水一带山坑，留下了一批伤病员同志，当罗翼恩接到游击队的通知后，向陈大勋医师要了一批药品。当他和黄履景、黄履光把药送到伤病员驻地时，部队同志列队向他们行军礼致敬。

同始兴城仅一水之隔的刘镇营村，有一间基督教堂（叫福音堂），教会办有一所德华小学（后改为信仪小学）。牧师

凌德渊（狮石下人）兼任校董事长，一九四〇年省委交通员郭招贤任校长。凌牧师在郭招贤、凌信孚（其儿子、党员）等同志长期影响下，思想进步，是一位宗教界的爱国人士，长期同我党真诚合作。一九四〇年春，广东省委机关从南雄迁到始兴，省委电台初时掩蔽在教堂，后由省委交通员郭招贤同志转移到沈所红围省委机关。始兴沦陷后，教堂医务室常给游击队送药品（笔者曾多次派同志去取过药）。解放战争时期，还掩蔽治疗我部队伤病员，并几次掩蔽游击队的枪支和重要物资。凌牧师还积极支持自己的儿女参加革命活动。

澄江地区的知名开明绅士张鉴唐，任国民党乡长、自卫中队长，又是“三点会”大哥，社会交往广，有见识，在乡中有号召力。地党和游击队的负责人陈培兴、邓文礼、邓文畴、吴伯仲、黄洁琳、李子德、莫世延、李启民等许多同志，均曾与他来往接触，是与我党长期真诚合作的老朋友。张鉴唐从开始拥护抗日，支持革命，掩护我党同志的安全，最后投身革命队伍。

一九四五年春，张鉴唐组织抗日武装自卫中队，同风度抗日游击队并肩战斗。不久便接受我党领导，成为澄江游击中队。

一九四五年七月，地党派李启民同志去南雄联系“两王”部队。当时，李启民同志身无分文，又要进入日寇占领的南雄城。通过张鉴唐介绍，到老知交南雄驻三角岭自卫大队长陈光奎和另一个自卫大队长黄如东处，住、食、宿安全得以解决，黄如东还设法解决了“良民证”。因此，李启民同志顺利找到了南雄特派员陈中夫同志。

一九四五年八、九月间，国民党通缉我地党支部书记黄